

腾 龙 之 脊

21 世纪中国工业发展战略

THE TACTICSES OF INDUSTIAL DEVELOPMENT
ZN 21 CENTVRY CHINA FLYING DRAGON

于革胜 著
陶维国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腾 龙 之 脊

21 世纪中国工业发展战略

于革胜 著
陶维国

中国经济出版社

3

责任编辑:马晓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工业发展战略/于革胜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3

ISBN 7—5017—3604—9

I. 21...

II. 于...

III 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21 世纪

IV • F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011 号

腾龙之脊

21 世纪中国工业发展战略

于革胜 陶维国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860×1230 毫米 1/32 8.375 印张 21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7—5017—3604—9/F • 2602

定价:23.80 元

目 录

序章：坎坷百年 希望无限	(1)
第一章 他山之石——外国工业的历史轨迹	(25)
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概况	(26)
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38)
三、前苏联及东欧诸国工业发展的教训	(75)
第二章 21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90)
一、未来世界的大趋势	(91)
二、亚太地区的潮落潮涨	(98)
三、21 世纪的中国	(109)
第三章 我国工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构想	(122)
一、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思想	(123)
二、多元取向的总体战略目标	(131)
三、实现目标的主要举措	(156)
第四章 新世纪中国的工业化	(160)
一、中国工业化——未完成的任务	(161)
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70)
第五章 工业现代化的战略与策略	(195)
一、系统方法——工业现代化的一般策略模式	(197)
二、深化国有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战略重点	(215)
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基础工程	(237)

第六章 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242)
一、工业文明基因探析	(244)
二、现代工业文明——人为中心	(256)
结语：迎接辉煌	(262)

序章：坎坷百年，希望无限

公元 1995 年夏季的一天，太平洋西岸东中国海之滨某著名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平静而不无激奋地宣称：“17 世纪是荷兰的世纪；18—19 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未来的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① 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生于日占时期的台湾农家，身历了抗战、“光复”、两岸分裂、台岛“经济起飞”等等历史变故；大学毕业，先事工厂管理，复又东渡深造，现已执教大洋彼岸 20 余载，可谓曾经沧海！他的预言，究竟有多少成份是科学的推断，又有多少是域外华人思根情愫的流露，甚至就连这种预言本身的确当含义是什么？我们一时都难以剖析。然而可以肯定：这绝非梦呓，不是狂言，更大异于沙文主义的乌托邦。它反映了最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华人追求进步的心声；是一种

^① 引自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前北美中国会计教授会会长林文雄博士 1995 年 7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讲学的记录稿。

经历过无数失望后的希望，一个植根于祖国广袤沃土的实实在在的理想！

21 世纪的中国或者中国的 21 世纪——其实乃是一个多年来的世界性话题。早从本世纪中后期起，就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们陆续发表过多少类似于上面那位华人学者的言论。不过或喜、或慰、或忧、或惧，心态各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心存忧惧者之中，不乏许多倍受欺凌、无比善良的人们。数百年的血与火，使他们所形成的“称霸而强大”、“强大更称霸”、“愈霸愈强大”一类思维模式，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数量不多、但极有金钱和权力、视“弱肉强食”为人类社会演进“公理”的人们。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中国由衰而盛的发展史，只不过是“东亚病夫——假想敌国——争霸对手”这样一种神奇、简单而令人不安的角色转换。而所有这些忧惧和不安，最终无非集中归结成一个疑问：21 世纪强盛了的中国，会不会步世界近、现代史上诸列强之后尘？譬如，会不会象当年 8 国联军那样，攻掠了北京，瓜分了中国，还要堂皇地立下“公理战胜”坊^①！

对此，与其说是中国人，毋宁说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作出了再明确不过的回答：21 世纪的中国必须强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强大的中国决不称霸，因为称霸最终也要挨打。

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在人类思想史上首倡重视事物的本质，为此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有存在才是存在的。”同属于古希腊的世界哲圣之一苏格拉底则十分强调“认识你自己”。这可否给我们以启示：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虽然不是

^① 1900 年，8 国联军侵华之际，德帝国公使克林德因公然向义和团寻衅而毙命。腐败的满清政府屈节为之建“克林德碑”于东总布胡同；列强争霸的一战结束后于 1918 年更名“公理战胜”坊迁中山公园。1953 年，北京召开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期间，该坊重新命名为“保卫和平”坊。

不在意)世界如何推测、预见、议论未来的中国。因为中国的未来不会仅仅由于世人的赞颂或诅咒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一些。中国的未来主宰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因此,让我们暂且撇开“21 世纪——中国的世纪”这种假设(目前我们不能不直言这只是假设),回到现实之中,冷静地自问一句:我们如何使 21 世纪的中国强盛起来?

同样是历史,通过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数代伟人之口,给出了最基本的答案。那就是: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之路。

……龙之国——中国古老、神秘、高贵的专有别称之一。然而,本世纪 70 年代起,也是在太平洋西部海域,北、东、南中国海内外,继日本经济振兴之后,突兀间跃起了韩、新、港、台“四条小龙”;90 年代以来,又陆续有人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称之为新的亚洲“小龙”。以何为证?人们普遍认为较过硬的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 \cdot N \cdot P$)。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地区这条巨龙的人均“ $G \cdot N \cdot P$ ”分别约为亚洲“四小龙”的 $1/10$ 、 $1/16$ 、 $1/23$ 和 $1/26$;相当于泰、马、印尼的 $1/2$ — $1/6$ 。值得深思的是:与西亚中东豪富的石油出口国相比,东亚、东南亚的一群“小龙”大多缺乏俯拾即可换取巨额硬通货的宝贵天然资源;“鱼跃龙门”,奥秘何在?或曰人民勤劳、智慧,或曰高科技领先,或曰全方位开放,或曰“无烟工业”大发展,或曰美国的经援与“越战”,或曰中国儒家文化的长盛不衰——真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否应该更加强我们自己的信心呢?因为:“小龙”们所拥有的条件,绝大部分我们早就具备或者正在具备;“小龙”们所没有的一些条件,在我们却是得天独厚;尤为重要的是,“小龙”中的台湾和香港,本就是中国龙躯体上绝不能分离开的“片鳞”与“一爪”。同时更不应无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整体实力的显著增强。故而展

望未来的世纪，只要全体中国人再多些忧患意识、再多点实干精神，“一国两制”，团结统一，整个中国巨龙的腾飞应可期！

本书将以现代化为主线，专门讨论 21 世纪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工业、农业、科技、国防这四大部门的地位孰轻孰重，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它们彼此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密切协作、不可或缺。但在基本的发展方略上，有两点也必须同时说明：

第一，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言，由于疆域大小、地理区位、人口数量、自然资源、种族习俗、政治体制等具体条件不同，对于各部门的侧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属于城市型国家，国土面积甚小（新人自称“蕞尔小岛”），农业生产相应受到极大限制，产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 1%（1990 年统计资料；下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60%（其中尚不包括作为该国另一独立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产值）。工业产值充其量约在 30% 左右，而且集中于为数不多的重化工行业（石油提炼、造船等），缺乏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该国粮食的全部、蔬菜的一半和不少日用工业品需要依靠国际贸易来解决（进口）。很显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空前发展的今天，新加坡的这种经济构架是既与其国情相适合，也为其国力所许可的。设若换在今日之中国，则此种结构无论是讲国情，还是凭国力，都万难行得通。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同时代（或时期）的主、客观条

件不同,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实际地位和人们的因应策略(包括重视程度)及实施后果也是有所不同的。远古时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都相当低下,主要倚赖渔、猎和采集天然植物为生。在其中的“蒙昧时代”,“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① 进入“野蛮时代”,人类逐渐学会了制陶术、冶炼术等手工业技术,相应服务于动物驯养和谷物种植,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由此而产生并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在中国,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资源和区位)、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形态演进过程及社会上层建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决定性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与此同时,出于对土地这位“财富之母”的钟爱,戎边拓土的国防、军事活动也长期受到有识之士和有为君主的高度重视。并相应形成了具有古代中国封建特色的“农战理论”。所谓“农战理论”,简言之即基于“劳教定则国富,死教定则威行”^③,“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④ 一类思想,主张重农、强兵,“省工贾”^⑤ (抑制工商业发展)。虽然科技、工商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终究不会依某些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例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就出自于古代中国,郑和下西洋也不失为古代中国拓展中外政治经济交流的一大创举——但是历代封建王朝僵化地以“农战”理论为依据而制定治国方略,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时期较普遍地以商贾之事为“末业”,视科技、工业为“奇技淫巧”,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人为地阻碍了古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最终后果——虽然此前有过大唐时期的极度辉煌——是近代中国的贫弱、愚昧、落后和屈辱。同样出于特有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8、145 页。

② 同上。

③ 语见《管子·修靡篇》。

④ 语见《商君书·农战》。

⑤ 语见《荀子·君道篇》;全句为“省工贾,众农夫”。

的历史条件，欧洲一些国家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在兴农、强兵的同时，重视商贸、航运、自然科学研究、机械发明与制造——虽然其间也曾对科学家实施宗教裁判和火刑、经历过中世纪长时间的恐怖与黑暗，但终于在近代成为世界列强，为其现代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上两点告诉人们：从最一般、最抽象的意义上讲，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大部门各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互不可替代。例如新加坡本国除花木和蔬菜种植业外几乎没有农业产业，但她必须依赖他国的农业以保证国民的生存。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工业、科技的独立发展——或者说工业、科技与农业、手工业相分离并独立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显著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①注意在古代的欧洲，“艺术”(art)一词实际上包含着“技术”。

中国素有种种“大国”之称，诸如人口大国、土地大国、海洋大国、资源大国等等。然而近代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只能称作一个极为闭塞、落后的封建大国和农业大国；不过象逐渐衰落的富豪一样，还有那么一些“金银细软”，还没有丧失自主当家之权。鸦片战争炮火熊熊，一点点家底随之灰飞烟灭，中国也开始仰人鼻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到1949年，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才重新真正地强大起来。但是，在经济上，中国固然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的转变，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却至今尚未完成；中国至今还不能称为一个“工业大国”。试看1994年我国各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0—1)：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表 0—1 1994 年中国各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①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 业	建筑业	
比重(%)	18.8	41.9	6.6	32.7

如果不考虑绝对额,不考虑劳动力结构等重要因素,孤立地分析上表,人们很可能错误地认为中国已进入发达工业国的行列。可是,事实无情:1994 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43800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不足 6000 亿,约为 70 年代初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4(1971 年美国的 G·D·P 为 7361 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农林渔牧)产值折合美元约为 1000 亿,相当于 70 年代初美国第一产业产值的 3 倍(1971 年美国的农业增加值为 309 亿美元)。创造这 18.8% 产值的劳动人口,粗略估计约为我国全部劳动人口的 60% 左右(据世界银行资料,1981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全部劳动力的 74%,考虑到 10 余年来乡镇工业的发展及亦农亦工人口的增多而作出此种推测)。反观世界上工业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美国 70 年代初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约为 3—4%(1981 年为 2%);前苏联 70 年代初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则为 25% 左右(1981 年为 14%)。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2)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还相当的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

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发展滞后,原因错综复杂。但最客观、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却是农业机械、农用电力、化肥施用量等等指标水平的落后。由此而映衬出工业这一国民经济各产业的

^① 据 1995 年 3 月 1 日《人民日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编制。统计范围不包括台、港、澳地区;产值已同国际接轨按“增加值”计算。

“装备部”的相对落后。这，也就是本书之所以专门探讨 21 世纪中国工业发展问题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缘由。

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许多类似的中国格言都在提醒我们：探讨中国工业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始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发展至今已历时 130 余年。一部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工业史，如同整个中国社会受尽磨难、历经沧桑的近现代历史一样，充满了艰辛、曲折和坎坷。

必须指出：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130 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①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1)前 80 余年（——止于 1949 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加剧殖民地化的时期；(2)后 40 余年（始于 1949 年——），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两个社会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虽然中国工业在这两个阶段中都曾经受磨难、艰辛和坎坷，但相应对中国工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却显著地有所不同，分别深深地刻记着各自时代的烙印。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并不是孕育于鸦片战争（1840 年爆发）前达 300 年（16 世纪中后期、明朝中叶起）之久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长壮大的结果。而是早就昏庸腐败、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头子们被帝国主义列强的隆隆炮声震吓得丧魂落魄后的“病急乱投医”。

^① 严格、准确地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分期应为：近代，1840 年——1919 年；现代，1919 年至今。此处因系讨论中国工业经济问题故从我国近代机器工业初创年代谈起。——作者

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昏聩、愚昧，可以从他们对于世界列强基本国情的茫然无知上看起来。鸦片战争前的满清帝国，号称“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基本上实行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中国的地大物博，久已为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列强所覬覦。清王朝建立之前和之初，葡萄牙（1557 年窃据中国的澳门为其殖民地）、荷兰（1623 年起强占我国的台湾，历时 38 年）等国就对中国进行了海盗式劫掠。清王朝一统天下之后，即从 17 世纪中期起，英、法、沙俄、荷兰等国更是变换手法，或胁迫通商，或武装占领，加紧了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王朝和列强互打交道已有 200 年之久。可是，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 1842 年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前几个月，朝廷向台湾地方官发出了一份既令人啼笑皆非，更使志士仁人悲叹愤懑的“廷寄”（责其查询英、俄两国情况）。该“廷寄”曰：

“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
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
无旱路相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
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①

掌握国家命运的皇帝和中枢大臣们颡顼、痴钝至此，无怪乎人们发出了“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魏源）和“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的无限感慨！

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初散，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不久，京师便又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景象。什么兵备，什么民生，统统被王公大臣们置诸脑后。如此 10 多年，封建中国加速了衰朽，列强进一步大开了鲸吞中国的胃口。1856 年，英帝国率先寻衅点燃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第一阶段战事，以清王朝屈膝投降并分别

^① 转引自湖南师院编《近代中国史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 页。

同俄、英、美、法订立卖国的《天津条约》而告终；第二阶段，则以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咸丰帝窜逃热河，恭亲王奕欣出面投降，同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为终结。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集中华民族工艺、美术、建筑、人文文化于一体的北京圆明园横遭焚掠。对此，凡有良知的中外人士莫不悲愤填膺。1861年11月25日，世界名著《悲惨世界》的作者、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致信一位侵华法军军官，曾这样写道：“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①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给予清朝统治阶层的唯一教训，就是领略了洋船、洋枪、洋炮的厉害。因此，一方面，清政府逐步丧失其政治上的独立性，开始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最终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在自诩中国旧有的文化和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同时，承认了“独火器万不能及”的缺陷。在此种刺激之下，号称“自强新政”、以图“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人自己经办的近代机器工业也就由此而产生（此前10余年，外国侵略者已在中国开矿办厂）。

清政府创办的机器工业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主体，有着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第一，从根本目的上看，完全是在所谓“自强新政”的幌子下，维持和巩固封建主义统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清王朝便“引鬼入邦”（洪秀全语），勾结帝国主义，利用洋枪洋炮，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1864年）。总结此次“胜利”，李鸿章说：“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②，左宗棠则称：“虽

① V·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载1995年1月15日《光明日报》。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页。

曰兵精，亦由器利”^①。由此而决定了自办近代军事工业，从而使之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之发端。可见，“安内”（镇压人民反抗）实为清王朝创办工业的主旨。

第二，从兴建和管理来看，既具有封建性，又具有买办性。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廷国库虚空，耗资巨大而又非商品化的军火工业使之不胜负担。洋务派主政官僚们煞费苦心，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征集民间资金，兴办了一批以“求富”为中心的商品性的民用工业。这些民用工业，或假以“官商合办”名义，或假以“官督商办”名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强制性，大权在“官”，实行封建衙门式的管理；都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军事目的。例如，开办开平矿务局是为了“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②，创建电报局则因为“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③。其它一些与军事无直接关联的民用工业如机器织布局、纺纱官局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先谋利而后支撑“自强”之军火工业的目的。此外，无论是以“求富”为中心的民用工业，还是以“自强”为宗旨的军事工业，在兴建和管理上，都基本上仰赖洋人，明显地带有买办性。首先，这些企业一方面仿造洋货（如外国枪炮），一方面采办、推销洋货；其次，企业生产所用的许多主要原材料大都向外国采购，如“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④；再次，建厂管厂多用洋人，全无培养本国人材的设想。故时人抨击道：“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⑤

第三，官僚贪求一己私利，洋商倾售滞后技术，管理混乱，效益低下。列强与封建统治者合流，襄助所谓“洋务新政”，并非想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达到“船坚炮利”的地步。其真实目的，一是要借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2，第 87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40，第 42 页。

③ 同上，卷 38，第 56 页。

④ 同上，奏稿，卷 9，第 56 页。

⑤ 陈炽《庸书》，外篇卷下，自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I，第 247 页。

此操纵清朝政府；二是让清王朝确能在一定限度内强大一些，以防范和镇压中国人民对于中外反动派的抗争；三是乘机大发横财。因此，他们通过贿赂中国官吏，大肆倾销在西方已经过时的枪炮舰船和机器设备；推荐在本国吃不开的蹩脚货甚至骗子手为中国厂矿的教习、技师、管工。把持企业的封建官僚又多不懂经营管理，不知成本核算，从而虚耗了大量财力，所收实效却甚微小。1875年1月，金陵制造局由英国人马格里监制的7门海防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结果，3尊炮身爆裂，炸死兵丁7人。此前，当时最大的江南制造局试造小铁甲船，也曾出过船“不能出海，炮位布置，亦不合合法”^①的洋相。所以，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当外敌入侵之际，曾经无奈而又无耻地“预为声明”，洋务工厂所制兵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②

第四，利用封建特权实行垄断性经营，媚外、抑内，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经办的军、民用工业，无论形式如何（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都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性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洋务派官僚在经营上实行垄断，禁止民间资本独立兴办新式工业。李鸿章创办上海织布局时就明确提出“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③上海商人叶某请求自设轮船局，李鸿章驳道：不准另树一帜。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为保证其在华利益，也竭力阻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某英国人便曾说过：“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销路既阻，出货必减”。^④封建统治阶层压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实质上是为洋货倾销开了方便之门。故19世纪70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由于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1页。

② 同上，卷24，第13页。

③ 同上，卷43，第44页。

④ 杨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88页。